

第一章

苗族信仰的文化生境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生存背景和生存空间。对于湘西苗族信仰来说，湘西的地理及自然因素、历史及人文因素，以及多元文化相互吸纳并存的状态对湘西苗族信仰的发生、发展、内涵、特征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一、地理及自然生境

“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他一定占有一片特定的自然空间 这片空间中所有自然特性则构成了该民族的自然生境。”^① 共同的地域是民族文化形成的基础和条件。虽然我们并不同意地理环境决定论，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否定地理环境对于文化的影响。文化的形成离不开人类的生存环境，了解古希腊人活动的主要舞

^① 杨庭硕、罗康隆、潘盛之著：《民族文化与生境》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 1 页。

台——希腊半岛和爱琴海区域的地理环境，有助于理解古希腊人何以创造了那样辉煌而且影响深远的文化，同样，了解湘西地区的地理及自然环境，亦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湘西地区苗族的文化及其特点。

湘西地处云贵高原的余脉武陵山区，位于东经 $109^{\circ}10' \sim 110^{\circ}55'$ 北纬 $27^{\circ}44' \sim 29^{\circ}47'$ 。东界石门、慈利、桃源，东南接沅陵、辰溪、麻阳，西北邻贵州、重庆、湖北三省市。这里山势险峻，群山耸立，沟壑纵横，河谷深切，溶洞幽密，自然景观神奇而妖娆，是一块形胜之地。

这里的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西北依渝鄂屏山，山体高耸，海拔在 800 米 ~ 1 200 米之间。东南为低山丘陵，海拔在 200 米 ~ 500 米之间，并有雪峰山为屏障，把湘西与湘中平原、丘陵地区划而隔开。由西南至东北走向的武陵山则贯穿古丈、保靖、永顺、张家界等县市，其支脉绵延全境，构成奇峰竞秀、气势磅礴的武陵山系。由东向西，地势逐渐高抬，直与云贵高原衔接。山上梯田层层，山间多小型盆地，如廖家村盆地、召市盆地、万坪盆地、甘溪盆地、兴隆场盆地等。北部八大公山的主峰——斗蓬山是全境的最高峰，海拔高达 1 894.4 米，莽莽苍苍，浮腾于云雾之中。西部八面山与曾家界、洛塔界等大山对峙，山上有山、山中套山、山峦重叠，地势十分险峻。

西南部主要山脉为腊尔山。《苗防备览·险要考》云：“大腊尔山，城凤凰，西 70 里，高 10 余里。山势甚大，跨楚黔两省。东之鸦有、夯尚，南之栗林、有泥，西之亢金、嗅脑，北之葫芦、箐子坳，具系此山脉，绵亘百余里，其上苗寨甚多。故往史称湖、贵苗生，岷者必腊尔山。”

腊尔山由贵州正大营迤透而来，至苗疆中部，山脉因断层而构成台地的地形。腊尔山台地，系平均海拔在 800 米 ~ 1 000 米之间的高山平地，台地地跨两省，湖南、贵州四县，凤凰、吉首、花垣、松

桃)以凤凰县所辖面积最广。凤凰县在此设有腊尔山区,区内设两镇三乡,即腊尔山镇、禾库镇、两村乡、柳薄乡、米良乡。全区64个村,苗族人口占99%,约50000人左右。台地之上,苗寨星罗棋布,“苗人据险以守,向为生苗巢穴。”这里是四省边区苗族最为集中的地带。清代著名的“乾嘉暴动”即发生于此。

西南部腊尔山台地紧靠云贵高原,那里有一座云蒸霞蔚的天星山,是当年苗族起义英雄吴八月与清军浴血奋战的古战场。雄峰如利剑穿空,绝壁如刀削斧劈,山腰“之”字形栈道凌空盘旋而上。中部雷洞山,苗语称“苟剖苟娘”,汉译为祖公祖婆山,在保靖县境内,又名雷洞山。石启贵先生曾对雷洞山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大而且高,为群山冠,登峰纵览,一望莫极,周见数百里,四面之高坡,尚不到该山之半腰中,无异湘省之小南岳。由上俯视,万山低微,由下仰视,峰顶际天,四季清风徐徐,酷暑至之,初觉凉爽,久必透寒,非穿夹衣或棉衣,不能耐坐两小时。冬季积雪,月余不消,风冻结冰,倒悬崖壁,洞口如同银条玉柱,数月不溶,寒气逼人。山高谷深,鸟雀难飞。大吼一声,震山应谷。举目四顾,奇景万千。并有穿石一座,云烟长横,恰似玉带缠腰。阴雨晦月,一日之中,变幻无常。山涧溪水,蚂蝗毒蛇,亦不知凡几。闻该山邪气太重,日有长鬼,夜有妖魔,生人往观,不得任意多言多笑,舆论非议尚不自慎,必遭危害之虞,身命莫保,不是毒蛇蝗虫咬人,便是肚痛剧烈也。关于草木奇药妙方,生产尤多,各地找不出者,此山俱皆有之。最怪者,莫如一大干洞,高而且阔,容人数千,大雨滂沱,霾烟密布,雷声隆隆,电光闪闪,似有活神活鬼在焉。若观者身藏食盐,故意嘲笑言欢,即黑雾沉沉,风声骤起,令人惊恐,且毒蛇蚂蝗蜂拥而出,近身而来,待欲咬人,游人骇异。相传洞中有雷神,此是雷神使蛇虫出现,以示灵威,所谓雷洞山者,即因是而得名。”^①另有天

① 石启贵著:《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页。

子山，寓居于桑植县东南边缘地带，整个面积为 45 000 多亩 中部高，四周低，活像一座硕大无比的宝塔。塔上镶嵌着黄龙泉、凤栖山、老屋场、茶盘塔、石家詹、黄河岸、昆岭峰等七颗明珠，全山风光 峻峭奇丽，有如仙境。张家界市的天门山，花垣县的摩天岭，海拔都在千米以上，并有多处高宽均达数十米的穿山溶洞。

除了雄奇险峻的高山，这里还有不少石灰岩岩层形成的许多奇异的石峰、深邃的洞穴、忽隐忽现的阴河，神秘莫测，有如鬼斧神工。如古丈县的广塘河以西、细塔河以北地区，有一落数十丈的天坑、空山；张家界市的天门山，花垣县的摩天岭，山内均有多处高宽均达数十米的穿山溶洞，高山之上还有湍急的水流；另有吉首市的大龙洞瀑布从 217 米高的陡崖上直泻而下，蔚为壮观。石启贵先生在调查走访了湘西各自然地理面貌后对湘西的洞穴名胜尤有重述，在其著作中这样描述：

天然洞谷 大小各别 冬暖夏凉 深邃回曲 小者可容数人至数十人，大者可容数十人至数千人，甚有可容万余人者。如凤凰之火麻、泡水、两头羊、栗林、新寨、大龙洞 乾城之坪垆、新民、黄乐、中阿 永绥之高岩河 排碧、下寨河、灯笼坪、小排吾、小安寨 保靖之水田河、夯砂坪、雷洞山、鼻子寨、水踏溪、葫芦寨 古丈之龙鼻咀、排打中、九龙洞、曹家坪、河蓬、坪坝等地 皆有天然洞谷。或生于山麓，或生于山腰，或生于绝险悬崖，或生于乱石林丛。洞内或宽平、或弯曲 高低不一 深浅莫测 洞口或高大 或矮窄 隐蔽异常，视之莫见，非有熟人引导，不知有其洞穴也。至其种类，又分干洞、湿洞、水洞、土洞多种。水洞暗潜伏流，长达数十百里，门涌飞泉，高达数十百丈。干洞多有泉水，大者穿山而过，曲折隐蔽，坚固异常 储备军需 保存古物 隐学造书 稳如泰山。如为匪盗盘踞 易守难攻 剿除甚难 若为举世凭借 可以立足守险 古之征苗为此因

也。天时地利，岂不重哉^①

在这里 除有洞谷泉水 还有大小溪河一千多条 经纬错致 水网纵横，主要有澧水、沅水及其各个支流，五溪及沅水五支：酉溪、辰溪、巫溪、武溪、沅水。这些河流多乱石、暗礁，滩多水险，故有今日之茅岩河和猛洞河漂流的旅游胜观。

最大水为沅江，支流武溪，又名峒河。沅江深切入湘西地区之中，其源流分为三支：一为乌巢河，一为万溶江，一为高岩河。乌巢河源出于凤凰的小天星寨，然后西折流入水沱，有龙角洞等水汇入，后又西经大新寨，绕上下猿猴寨，南至麻冲，小凤凰营水在此汇入，后东南流去，过马颈滩绕盛华哨至提溪，白岩江水从西北而来汇入。后东绕凤凰县城，改称为沱江。再东流到城东，新地溪水西向而来汇入。向东北流经雷公洞，有万根溪自北而来汇入。转东北到溪口，有小溪水汇入。至昌州进入泸溪界下老虎口再到将军岩，有茨水、仲水等汇入。向东北流到河溪与万溶江汇合。

万溶江发源于大天星寨，南行绕岩口汛到木里汛，然后折向东到老幡潭，西门江北流汇入。又东北去绕三脚岩过龙滚营到箐子哨，鹤如寨水东南流入。再东北流至乾城（今吉首）与武溪水东流汇合，自这里起，改称武溪。

武溪向东流去，达至鸦溪，鸦溪水南来汇入，再向东至张牌与高岩河相会。高岩河发源于永绥（今花垣）的大龙洞小龙洞，合潮水、老寨、黄土等溪水流到高岩，再东至小冲，有小冲溪水汇入，再往东过伟者，有平郎溪水南来汇入。又往东至溪头汛，有吕洞水南来注入，往东至镇溪所，与镇溪、新寨溪汇合。往东南折至张牌寨与武溪会合。往东南去十余里到溪口与沱江汇合，然后改为峒河。再东到楠木桥，楠木溪水北流汇入。再向东至思麻溪口，思麻溪水南来汇入。向东到潭溪口，潭溪水北来汇入。东到能滩，与发源于

^① 石启贵著：《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页。

巴斗山的湾水绕四都、五都至茅坪合马旺溪，桑溪等水东南来而流入汇合。东至洗溪堡，洗溪水北来汇入。再东至苏木溪口，苏木溪水流注汇入 再东至泸溪城 流入沅江。

西水支流松桃河，环绕苗疆的西北，其有两个源流：一源出于贵州平头司西南，经太平营之北折而东北；一源出于平头司西北，自西而东，与南支相会共道而东，接纳三不管水，云罗屯至松桃城，张鬼溪、马乾溪水先后汇入。然后过篙坪进入永绥到米糯，米糯溪水汇入。向北流经本树汛、潮水塘，到腊尔堡、大帽溪。又北到潮水塘，潮水溪汇入。又北至腊尔堡、大帽溪，有木树河、潮水溪汇入，最后接纳刚溪、老木溪、隆围溪。向东北流入永靖界到古铜汛，古铜溪水注入。再往东北到西河口，注入西水。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属于亚热带山区气候，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平均气温，春季为 $15.6^{\circ}\text{C} \sim 16.7^{\circ}\text{C}$ ，夏季为 $26.7^{\circ}\text{C} \sim 28.2^{\circ}\text{C}$ 秋季为 $16.7^{\circ}\text{C} \sim 18^{\circ}\text{C}$ 冬季为 $4.6^{\circ}\text{C} \sim 5.3^{\circ}\text{C}$ 年极高温多出现在 7 月下旬到八月上旬，一般在 38 左右，年极低温多在一月或二月上旬出现，一般在 6 左右。由于这里地形起伏，平地和高山，气温悬殊较大。在高山深谷地带，常常山麓是亚热带气候，山腰是温带气候，山顶却是寒带气候，真可谓一山有四季。这里无霜期较长 约在 150~280 天之间。雨量充沛，年总量平均在 1 290~1 600 毫米之间。主要集中在春夏两季，东北部降雨多于西南部。北部八大公山地区是全境降雨最多的地方，平均年雨量达 2 300 毫米。由于腊尔山台地是一个四周没有峰脉，中间没有沟壑的完整平地，从云贵高原来的冷空气，可以横扫整个腊尔山台地，使台地保持一种独特的气候特征，终年凉爽，平均气温比山麓要低 $2^{\circ}\text{C} \sim 3^{\circ}\text{C}$ 。腊尔山雨季长，年达 100 余天，在马河有一千年初古树 古树枝杈覆盖直径达 30 米，古树下有一整块巨石板延伸开来，石板上有上千颗小石坑，系长年雨季雨水从树叶上滴下而成。

由于地势高，云雾多，这里的年平均日照时数只有 1 200~

1 500 小时。一年之中，日照时数以 5~10 月为多 这对主要农作物的生长是有利的。

当然，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气候条件也有不利的一面，那就是容易发生干旱、山洪、冰雹和冰冻等自然灾害。干旱对农业生产的威胁最大，以夏旱、秋旱最为常见。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百日大旱 据 1958 年到 1976 年气象资料统计，全州各地发生中旱（30 天以上）为 12 年，大旱（46 天以上）为 7 年，1981 年夏旱连秋旱 长达 93 天，致使溪河干涸，农作物歉收。山洪也是春夏季常见的自然灾害 每逢连日暴雨 山洪暴发 冲毁田庄 带走人畜 致使很多受害者家毁人亡。还有冰雹，几乎每年都成带状地发生在局部地区，一般每年都一至二次 多集中在二至五月间。此外 大风、冰冻的伤害也不浅。

湘西地区，峰峦重叠，山高水险，交通十分闭塞。清以前陆路“险峻崎岖 窄如羊肠 土路多而石路少。绕溪越岭 时上时下 幽深险阻 回绝人寰 登涉艰难”。^①至于水道，“除乾城黄乐乡之大兴寨河，可通小舟商运外，其它无之。因此交通梗阻之故，边县之苗人 不但少与汉人接近联络 以厚情谊 即同族中之山前山后 距离而居 言语各异 风气各殊 造成不同之环境耳。”^②清以后 交通状况有所改善，许多河流经过了初步整治，过去仅有羊肠小道的苗山也修了官道。对此，苗族人民的贡献极大，苗族绅士也作出了贡献 如乾隆年间 城步富绅杨再达自出资金 费时十年 从城步到广西义宁，修建大道百余里。^③道光初年，永绥厅紫儿寨富绅石文魁，自出资金修建桥梁数十座，开道数十里，并将艰险的矮寨坡劈

① 石启贵著：《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第 7 页。

② 石启贵著：《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第 7 页。

③ 光绪《湖南通志》卷 190《周朝人物》。

石开为大道,^①使川湘交通进一步改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及上级交通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湘西交通事业发展突飞猛进。50年代实现了县县通公路,8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采取以工代赈办法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大规模地开展交通扶贫,湘西交通落后的状况有了显著改善。1978年12月枝柳铁路建成通车,标志着湘西铁路、公路和水路三位一体的综合运输新格局初步形成。枝柳铁路由北向南纵贯州境5个县市,构成湘西交通运输的主动脉。水路运输以沅水为主,可通江达海。到1995年底,湘西公路总里程达4998公里。其中,从湘西过境的209国道和319国道429.7公里;省道4条(1801线、1828线、1841线、1861线)307.8公里;县道36条,1289.8公里;乡道98条,1515.6公里;还有未列入正式养护的简易公路1445公里。全州218个乡镇通车的有216个,通客班车的有207个,分别占全州乡镇总数的99%和95%。全州2657个行政村通公路的有1664个,占全州行政村总数的62.62%。交通事业有力地促进了湘西经济的发展。

但湘西交通现状与发达地区比较,仍然相对落后,与自治州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一是干线公路分布不够合理,保靖、龙山、泸溪和花垣4个县没有省道,州域西部地区缺乏干线公路,境内209国道和1828省道现行走向不够合理。二是公路技术等级低:全州等级公路仅占总里程的58.29%,低于74.5%的全国平均值,除白沙至洗溪23公里二级公路外,其余均为三级、四级和等级公路,其中等外级公路比例高达41.71%。三是公路环通率较低,全州有2个乡未通公路,而通路的51个乡镇公路中,交汇车子的地方很少,多为单向行驶,公路环通率仅占节点总数的23.83%。四是通村公路建设任务艰苦,到1995年底,全州未通公

路行政村 993 个 占行政村总数的 37.38%。以上情况表明 交通“瓶颈”问题仍然严重。可见湘西的交通相对于中原发达地区来说 还是有很大距离，与湘西地区现代化的要求还存在着差距。

总之，正是这样的山，这样的水，这样的川洞幽谷，这样的交通，构成了湘西地区独特的生存背景，使世代生于斯长于斯的苗族人民与这些自然物结下了不解之缘，并深深地影响到他们的情感、思维与行为，使人在这样的环境里颇能酝酿出种种神秘的气氛和浪漫的情怀，启发人们的幻想，从而派生出终古不化的巫风，形成风格独具的自然宗教信仰。

二、历史及人文生境

苗族历史所经历的种种变迁，及其独特的历史遭遇和生存境遇，为苗族信仰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历史与人文环境，给苗族信仰的生成与发展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形成风格独具的信仰特征。

对于苗族历史发展的特点，诸家多有论及，综合各家的观点，我们认为基本特点如下：

第一，苗族历史发展的起点比较高，但后来长期处于滞缓和后进状态。这一方面是由于苗族先民连续的大迁徙和生活环境的不断变异 打乱了苗族社会自身发展的进程“筚路蓝缕 以处草莽”的情形往往是周而复始；另一方面，则是炎黄大战蚩尤，禹征“三苗”和商周“讨伐”蛮荆 到历代封建统治者对苗民的“征讨”给苗族人民带来灾难并造成生产力的极大破坏。苗族历史发展的这一特征致使苗族的信仰长期处于原始的最低层次的万物有灵的阶段上，贴紧自然，所关心的始终是与生存相关的问题，从而决定了苗族信仰强烈的世俗性和独特的鬼神观这些基本的内涵和特征。

蚩尤黄帝之争自涿鹿一役以后，苗族从此成为驱逐与征剿的

对象 被历代统治阶级“一再驱逐 摈异之甚”，^① 致使苗族人民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西南背井迁徙。“商周之世 高宗伐鬼方 召虎平荆蛮，周公惩荆舒。苗民受芟夷，大有冰消瓦解之势。列周兼并，七国雄立，势厚力强，大启疆域。秦汉继之，威加天下。当时汉官，视苗民溃败 高涨威力 大肆挞伐。自此以后 汉族势力愈统一 苗族势力愈涣散 其窜居之地盘亦愈恶劣……”

这以后，统治者对苗族的征剿更是不断。战国时，庄蹻徇滇，司马错伐黔中，汉兴武帝遗威武将军刘尚、伏波将军马援“击五溪”后经两晋、南北朝及唐、五代、宋、元、明、清 几乎历朝均有征苗之事，苗族百姓“从来未有百年安居无事也”。^② 统治阶级的残酷征剿，成为苗族不断迁徙的重要原因，从原本交通繁盛经济发达的黄河流域“窜居于江、汉流域”，^③ 继而又从江、汉流域“窜居湘、桂、黔、蜀、滇、康”^④ 等地。每一次迁徙都意味着放弃原生活多年的地方而达至一新的领地，而这新的领地往往又是蛮荒之地，一切待开垦、待种植，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牺牲膏腴，迁寄于不毛穷壤，放弃腹地，避住于深山丘陵。一逐再逐 逃千万里 扶老携幼 山岫避难。当时汉官对苗民，亦犹日寇对汉族 不讲道德 排除异系 掳掠烧杀 驱逐沦陷区难胞一般……历朝相沿 不予爱护 赓续不断的武力威胁 捣其堂奥 夺其财物 据其沃土 占其室家 大蹙苗民于荒谷中 殊失王道爱民之旨。悲悯苗胞 穴居野处 人物村居 极目皆非 采野充饥 无人相扶 痛苦情形 不堪述也。”^⑤

① 石启贵著：《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 31 页。

② 石启贵著：《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第 31 页。

③ 石启贵著：《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第 34 页。

④ 石启贵著：《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第 34 页。

⑤ 石启贵著：《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第 35 页。

⑥ 石启贵著：《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第 35 页。

如此的历史背景，给苗族社会带来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它使苗族社会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影响，也使苗族社会财富遭到大量的消耗，而过入之地，又多是荒僻山区，恶劣的自然条件阻碍和延缓着生产力的提高。

据汉文献记载，蚩尤时代已制五兵，创刑法。包括苗族先民在内的蚩尤集团社会发展水平，显然比由西部黄土高原东下的炎黄集团要高得多。然而尧、舜、禹三代对“三苗”的征伐和商周对“荆蛮”的征讨，使苗族社会的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苗族先民被迫一步步退出平原地带，向西南山地迁徙。到了自然条件恶劣的山区，苗族先民们又只得开辟榛莽，重建家园。苗族历史出现了很大的曲折，其社会发展愈来愈落后。

秦汉以后，每次战争和迁徙，也都使苗族的经济大大倒退。湘西苗族流传的史诗《休巴休玛》，叙述的情景十分典型。苗族先民们住在“占楚占菩”（即楚国江汉江淮流域）的时候，白手起家，用自己的双手建设了幸福的家园：“繁衍如鱼虾，收获堆积如山；人数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坚，生活越来越好，树屋盖瓦砌砖，女的戴金戴银，男的穿绸穿缎，牛马满坡满岭，猪羊满栏满圈……”由于遭到妖魔鬼怪“枷嘎”、“枷犴”的破坏，“人间坐不安宁，世上住不成家”，苗族被迫抛弃家园，离开占楚占菩，迁入武陵山区。最初是在“高戎霸凑”重新建立家园。苗族在“高戎霸凑”住了很久，举行过几次鼓社鼓会，一度非常繁荣。苗族的美好生活，引起了帝王的嫉妒和不安，派遣天兵天将攻打“高戎霸凑”，残害苗民。苗民又被迫背井离乡，迁徙到“泸溪峒”、“泸溪岷”。男的又来立家立业，女的又来积麻纺线。“住了多年后用勤劳的双手又建设起幸福的家园：繁衍如鱼如虾，收获堆积如山；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炊烟绕过九十九岭，歌声响彻万里长天。”不料，“枷嘎”、“枷犴”又来扰乱、破坏。苗民的七宗七房虽奋起相抗，但最后遭到失败，家园又被破坏：“祸害延及九十九岭，灾难遍及整个苗乡……”苗族人民又只得沿河向上

迁徙去开辟新的美好家园”。^①这种创业——迁徙——创业，周而复始的运动，大大延缓了苗族社会发展的进程，致使秦汉至唐宋时期，当汉族地区的封建经济已进入发展和繁荣阶段时，大多数苗族地区的封建制度才逐步产生和形成；生产力则长期停滞不前，刀耕火种的现象仍较普遍。直至清初“改土归流”后，社会生产力和封建生产关系才获得较快的提高和发展。

第二，为了适应动荡的生活，苗族以宗系为单位抱成一团，不管是在迁徙过程中还是在反抗外来侵略的过程中，宗族成为苗族人民心目中的至高无上的概念。这样的结果使苗族人民在分布地域上十分辽阔和分散，使各宗族与各宗族之间的自然地理状况呈现出差异，并造成各宗族内部社会生活的差异性。这种地域的分散性和各宗族之间的社会生活的差异性反映在苗族宗教信仰上，便是使苗族的宗教信仰呈现出浓烈宗族意识特征。

秦汉以后苗族各支系均逐渐进入封建社会，社会内部产生了贫富的阶级分化，但原始氏族制度残余却长期保留，直至近代仍能看到大量遗迹。各地苗族都是按宗支、姓氏聚族而居，每一宗支都有自己的祖先。相传湘西苗族就分为 12 宗支。湘西苗族地区流传的《苗族史诗》和《部族变迁》一章就叙述了十二个部落宗支的迁徙情况。十二个部落宗支是濮、仡佬、仡僚、仡蔑、仡灌、仡卡、仡削、仡徕、仡侃、仡宿、仡乡、仡佬。每个部落宗支又分成数量不等的小宗支。如濮宗支由 16 个小宗支组成，仡佬由 18 个小宗支组成，仡僚由 11 个小宗系组成，仡蔑由 8 个小支组成。苗族迁徙的时候，就是以各个宗支为单位进行的。

湘西苗族迁徙歌中，说他们祖先西迁到占楚时，已开始设立州县。当迁到沅江流域之后，就按姓氏“立村立寨”，同一个姓氏居住

伍新福著：《苗族历史探考》，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 年版，第 51 页。

在同一片地区，建立若干村寨。^①传说西迁时每个宗支队伍，都置有一个木鼓，敲鼓前进以作联系，避免掉队。迁到新地后就按宗支来重新建立自己的社会组织因而称为“鼓社”或叫“立鼓为社”。

一个宗族就是一个大“鼓社”。随着人口的增多，一个宗族又分为许多支，向四面扩展，因而出现了许多分社。……他们迁到新地方以后即以若干村社为一鼓，“立鼓为长官”也就是选举鼓头，掌管社务。一个鼓社除选有“果雄”（即鼓头）一人外，还选有“果叙”一人管祭祀，“果筋”一人管“礼乐”，“果当”一人管各种会议的仪式和座次，“果扎”一人管祭祀中杀牛仪式，“果西”一人负责会议祭祀活动时安排客人宿食，“顶王”一人管保卫安全，“顶保”一人管行政命令的下达，“珈屯场”一人管全社钱粮，共称为“鼓社九鼓头”。鼓头都有一定任期，数年十数年不等。鼓头选出后，全社都尊之如“长官”听其约束。^②

各鼓社均有自己的民主议事制度，根据古理和传统习惯，结合实际情况制度规约，以使人人遵守。其主要内容是保护公共的山林土地，不准任意破坏。管理集体生产生活，保护村社环境卫生，维护社会秩序，反对外来侵犯，等等。遇有大事，由鼓头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解决。生产由“活路头”领导，宗教祭祀由巫师主持，调解纠纷由“理老”处断。鼓社数年举行一次盛大的祭祖活动，要杀很多牛和猪。祭祖在当时情况下并不是社会的消极产物，而是有其积极的意义，它起着号召全体成员团结一致，继承和发扬祖先艰苦创业精神，繁衍子孙，发展生产，创造美好生活的作⽤。^③

第三，由于地域的分散和各地区各支系相互间的山水阻隔，苗族很难形成较大的相对稳定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未能建立起

① 湘西苗族古史长歌《奶棍玛苟》，《修相修玛》

② 《苗族简史》编写组：《苗族简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31页。

③ 《苗族简史》编写组：《苗族简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

自己相对独立的民族政权更无力去“问鼎中原”历史上长期处于被统治被奴役的地位，备受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为了争得自己民族生存的权利，苗族常常不得不被迫铤而走险，起来进行反抗斗争所谓“三十年一小反 四十年一大反”。这种政治上的分散性也是使苗族的宗教信仰一直处于最基本层次的自然宗教信仰阶段，呈现出分散性的重要原因。

自涿鹿一战，苗族就被置于了中央王朝的统治枷锁之下，历代封建王朝和地方官吏的民族歧视政策以及军事征剿，更加重了苗族人民的苦难，“一切民族压迫都势必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反抗趋势，都是民族起义”。^①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苗族人民揭竿而起，进行艰苦卓绝的反抗。据史料记载从西汉末年（公元5年）到国民党政权垮台的1949年间苗族共举行过大大小小的起义109次。^②秦汉至唐宋时期苗族的起义主要集中在武陵五溪及邻近地区，斗争内容大多是反对租赋和徭役剥削，矛头一般都是指向封建王朝和地方官吏，有明显的民族斗争的性质。

明清两代针对苗民的起义反抗在湘西地区构筑了一道边墙。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湖北参政蔡复一申请拨公帑四万三千余两，大修边墙，上起湘黔接壤的亭子关，下止乾州的镇溪所，绕山逾水蜿蜒起伏共有80公里。天启年间，又接镇溪所至喜鹊营添修30多公里。边墙修成后，派重兵扼守，当时驻边墙的兵力最多时达7800余人。乾嘉苗民起义的中心是凤凰西北的腊尔山地带为对付苗民的反抗清同知傅鼐实行“屯政”募乡勇修碉卡重建边墙对苗民实行包围在湘西凤凰、乾城一带与贵州接壤之亭子关起，沿明代修边墙，一直到与乾城交界的老营盘，沙坪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第55页。

② 《苗族简史》编写组：《苗族简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碉沿边一带共长 235 公里 建讯堡、屯卡、碉楼、哨台、炮台、关门近 800 座。

如果说长城表现的是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而处于守势的中原农耕民族的一种心态，那么，明清朝廷在湘西苗族地区构筑的边墙，则决不是表明其处于守势，而是要把那些富于反抗精神不愿归顺的苗民（生苗）置于化外治理。这样，在湘西就呈现出了一种奇特的文化景观，即在神巫精神弥漫下的多层次的生存圈和文化圈 即“熟苗”生存圈和文化圈，“生苗”生存圈和文化圈 这就像湘西大山一年有四季那样经纬分明。^①

清代湘黔苗民乾嘉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在苗族地区普遍实行“屯田制”“乾州厅‘均三留七’”“凤凰厅‘均七留三’”“永绥厅‘寸土归公’”清政府共掠夺苗族地区 152 000 多亩。地主、官僚、豪绅占有大量的土地、牲畜，有的大地主拥有 2 000 多亩田地并兼营榨油、染色、酿酒以及桐油贩运等工商业，有资本数千元。而苗民呢？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平地大部分被官厅抢去，山地出产不丰，丰收的年份，也要缺三四个月的粮食。

推翻清朝统治后 民国创立“务希改革”，一度取消了民族歧视政策，使苗族人民得到了平等。然而时日不长，国民党反动统治者“仍继清廷专制余孽 欺骗苗民 无所不为 压迫剥削 无所不至 并用奴隶制的手段，驾驭边胞，以大汉族之政策，压迫苗族。苗族因是痛苦已深 天怒人怨 伤心疾首”。^②苗族人民因受不了痛苦 纷纷起来反抗，先后有古丈的抗税抗捐，保靖的抗粮抗租，永绥的草屯抗丁等等，均遭国民党大肆镇压与屠杀。可怜苗族，又遭兵祸，痛苦愈深。

① 郑英杰著：《湘西文化世界的本体》见《中国湘鄂渝黔边区研究（3）历史文化·01》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9 年版。

② 石启贵著：《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第 35 页。

正是由于苗族长期迁徙与被征剿的历史遭遇，致使苗族的社会颇不稳定，而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与人为的阻隔更加重了苗族人民社会生活环境的封闭与困顿，经济难以持续发展。因而这样情况下的苗族宗教信仰就很显然难以向更高层次的神圣的“一元神”宗教发展，而始终处于最低层次的万物有灵信仰阶段，属于最原始的自然宗教信仰，但是，尽管是这样的宗教信仰，对于苦难的苗族人民来说依然不可多得，它像一股凝聚的力量，把苗族人民紧紧地凝聚在一起，相携相搀，共同走过漫漫的苦难的历程。

三、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辐射

湘西地处不同经济发展地区的临界点上，具有引东拓西的地域优势，与南面的百越文化体系，东北部的汉文化体系以及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体系处于碰撞共生之中。湘西苗族文化在其生存的过程中无不与这些文化发生联系，相对于汉文化板块来说，它是文化的边陲，相对于百越、西南文化板块来说，它又处于一个相互交融的共生体系之中，也可以说是一种西南边陲文化。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多种文化因子得以在这里发生碰撞。从历史上看，明以前的开发是由北向南，从襄樊经由湘西的文化古道南下至城步、通道、明以后逐渐出现由东往西的开发态势。东方汉文化经湘中由湘西而入贵州、四川、云南等地。不论是从北往南，还是由东及西，湘西始终处于一个文化交流的碰撞地带，这样，使得湘西文化得以吸纳众多它文化因子而充实到自己的文化体系之中。应当说湘西苗族文化之所以延续至今并葆有活力，就与这种吸纳与交流分不开，因为“任何一种现存的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化，都是一种开放性的文化系统，其系统内部的能量总是与外界保持着相互交流状态。在这种历史的自然交流过程中，系统不断地从外界获取

新的能量，并不断地使系统内部受到新的刺激，从而保持着一种随时应变的活力，并不断地更新系统本身”。^①

对于湘西苗族文化来说，对其发生深远影响的文化主要是指汉文化与楚文化。苗汉之间的交往与交流古已有之，尽管这种交往交流伴随着对苗族人民的征剿以及苗族人民的痛苦的迁徙。楚文化乃为苗文化的浓厚基底，楚地巫风对迁徙至此的苗族人民影响至深，楚国灭亡之后，与中原接壤地带的楚民亦多为汉文化所涵化，唯有聚居在武陵五溪一带的苗族等少数民族，因山势高峻、交通闭塞以及人们对楚文化的深深留恋等诸般原因，仍较好地保留了大量的楚文化遗风，尤其在原始信仰巫风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另外，许多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其它古老民族如土家族、瑶族、侗族所创建的文化也无不与苗文化发生关系。而苗族信仰正是在这样的长期生境适应和文化接纳过程中，形成了多元文化相互碰撞与交融的格局，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一方面，苗族信仰接受了道教和佛教的一神观念，创造了玉皇大帝、三清教主、南洋观音等尊神，一方面又顽强地保留了本民族祖先和自然崇拜，呈现出神鬼杂处、无主无次的多元信仰状态；一方面苗族信仰接受了汉文化的等级观念，给神鬼奉送了许多尊贵的封号，一方面又顽强地保留着自己的原始多神信仰特性，让神鬼共处一堂，呈现出尊卑不分、高下不辨的混沌状态；一方面承认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组织，一方面又沿袭了氏族社会的祀典祀仪，如傩祀活动呈现出现场面宏大而实际内容细小平常的矛盾状况。现今流传在湘西苗族的有关于“鬼”的起源的传说，就是受到汉民族宗教文化与伦理文化影响的产物。

按照苗族自然宗教信仰原则，凡自然物背后皆有超自然的力量支配 这种超自然的力量被称为“滚”意即“鬼”苗族的“万物有

^① 胡炳章著：《土家族文化精神》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